

W O D E M U Q I N

我的母親

周
立
波

第七輯



香港中國文化館出版

目 录

- | | | |
|-----------------|-------------------------|-----|
| 1、伟大的母亲 | 澳洲潮州同乡会会长 | 周光明 |
| 2、我的母亲 | 中国书法学术评委会委员、教授 | 刘小晴 |
| 3、我的母亲何舍耕 | 著名经济学专家 | 千家驹 |
| 4、母恩难忘 | 原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会长 | 王学仲 |
| 5、我的母亲 | (齐白石小女) | 齐良芷 |
| 6、不平凡的母亲 | 原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 谢海燕 |
| 7、我的母亲 | 作家 | 何鲁丽 |
| 8、思亲 |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 | 王 越 |
| 9、怀念我的母亲 | 原中山大学校长 | 李岳生 |
| 10、缅怀慈母赵陶氏 |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 赵光明 |
| 11、无法形容的母爱——忆母亲 | 广东省文史馆馆长 | 王铁文 |
| 12、赋得永久的悔 | 北京大学教授 | 季羨林 |
| 13、小小的篝火 | 台港文化研究所所长 | 潘旭澜 |
| 14、母亲疼爱我 |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 | 梁柯平 |
| 15、一代母亲 |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 潘 鹤 |
| 16、妈妈的赐与 后裔的楷模 | 湖南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潘基硕 |
| 17、可怜天下慈母心 | 原湖南省民政厅厅长 | 许岳松 |
| 18、真正的爱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陈心启 |
| 19、我的母亲 |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 田荔枝 |
| 20、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 | 大学教授 | 王钟琴 |
| 21、盈眶老泪缘恩亲 |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 萧蔓若 |
| 22、慈母心 | 原济南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 | 王中午 |
| 23、母爱的印痕 | 西北民族学院副教授 | 阎佩衡 |
| 24、东方妇女典型中的典型 | 湖南益阳市安化县一中离休教师 | 何子安 |
| 25、我的母亲 | 大学教授 | 姚 葳 |
| 26、忆慈母 | 广东省五华县教师 | 温公标 |
| 27、我的阿娘 | 广东省梅州市市委统战部长 | 郭 明 |

- | | | |
|-----------------|-------------------|----------|
| 28、怀念我的母亲 | 东江纵队老游击战士 | 刘树阶 |
| 29、母爱情深似海 | 新马归侨、民盟青岛市委联合支部主委 | 黄 焘 |
| 30、母亲的歌 | | 黄 焘 |
| 31、凡人锁事忆母亲 | 原南通市市长 | 王敏之 |
| 32、母亲 |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 叶 辛 |
| 33、亲情 | 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骆 文 |
| 34、摇篮内外 | 印度尼西亚知名华文作家 | 严唯真(林志强) |
| 35、母亲的发髻 | 菲律宾华文女作家 | 幽兰(洪仁玉) |
| 36、我的母亲 | 台湾中国美术研究中心国画书法教授 | 郭燕桥 |
| 37、哭我的母亲 | 上海《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 冯英子 |
| 38、洒向人间都是爱 | 汶莱知名华文女作家 | 一 凡 |
| 39、母亲的生日 | 新加坡华文作家 | 李 龙 |
| 40、母亲自己接生 | 新加坡华文作家 | 徐 帆 |
| 41、矛 盾 | 新加坡华文作家 | 严丽珍 |
| 42、我的母亲 | 新加坡《赤道风》杂志主编 | 方 然 |
| 43、母亲 | 新加坡华文女作家 | 古 琴 |
| 44、我的母亲 | 台湾中国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 | 苏雪林 |
| 45、妈妈,向挚爱的人生告别 | 台湾名作家 | 林清玄 |
| 46、终生苦难的母亲 | 黄埔军校十六期、记者、作家 | 伍天峙 |
| 47、母恩是报不完的 | 《我的母亲》副主编,记者、作家 | 周昭京 |
| 48、回忆我的母亲 | 国家一级书画师 | 单玉书 |
| 49、伟大的母亲 | 美国作家、画家 | 杨弘农 |
| 50、怀念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 原湖南公关进修学院院长 | 汤泽民 |
| 51、诀别——纪念母亲百岁冥寿 | 原湖南大学校长 | 成文山 |
| 52、从善务滋钦母德 | 《侨胞之功》编委会主任 | 谈石城 |
| 53、回忆母亲 | 湖南省政府财办主任 | 袁汉坤 |
| 54、母之爱 | 原湖南省黄埔军校外语学院副院长 | 王凯元 |
| 55、忆慈母 | 湖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 周笃佑 |
| 56、母恩铭心 | 上海市政协第七八九届常委、名书画家 | 汤兆基 |

- | | | |
|-------------------|--------------------------|-----|
| 57、我的母亲 | 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 | 钱谷融 |
| 58、我的母亲 | 广东教育学院副教授 | 温碧光 |
| 59、母亲 | 黄埔军校十六期、广州市第一百中学退休教师 | 黄鍾秀 |
| 60、我的母亲 |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 陈 隄 |
| 61、忆母亲 | 湖南孔道研究会秘书长 | 杨林生 |
| 62、我和我的妈妈 | 上海文史馆馆员林仲兴口述,杭州晏谊君女士执笔 | |
| 63、我的母亲 | 黑龙江鹤岗市书画院院长 | 温 刚 |
| 64、此时有子不如无 |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 金性尧 |
| 65、世上只有妈妈好 | 重庆市渝中区烟草销售公司 | 李文澜 |
| 66、悼慈母 | 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文学报》编委 | 陈 娟 |
| 67、让母亲享受应得的爱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梦花(汤淑敏) | |
| 68、母亲 |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画院名誉院长 | 陈永锵 |
| 69、母爱永恒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苏建伟 |
| 70、淡黄色的南瓜花 | 广州市作家协会 | 徐启文 |
| 71、家姑的遗泽 | 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编委 | 林秀心 |
| 72、天涯路远 | 作家 | 谢春红 |
| 73、从天空撒下鲜花 | 山东济南市 | 高梦龄 |
| 74、一篇虚构高考作文——兼忆亡母 | 北京鲁迅博物馆 | 陈漱渝 |
| 75、妈妈今年八十八 | 作家 | 舒 乙 |
| 76、妈妈今年九十四 | 作家 | 舒 乙 |
| 77、我的母亲 | 教授 | 程仁章 |
| 78、母为儿心碎 | 原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秘书长 | 吴 镕 |
| 79、浩浩母恩,长在我心 | 香港容斋出版社总编辑 | 郭伟明 |
| 80、我的母亲 | 记者、作家 | 高淑慧 |
| 81、一封旧家书 | 原西江大学副校长、肇庆加美海外学校校长 | 吴汉明 |
| 82、愧对母亲 |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 艾治平 |
| 83、我的母亲林淑如 | 香港美术研究会永远会长 | 赵世光 |
| 84、我的母亲 | 山东省济南一中 | 姚震渊 |
| 85、母亲的印象:闲不住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资料简报》副主编 | 俞润生 |

- | | | |
|-------------------------|------------------------------|-----|
| 86、母亲送我上黄埔 | 黄埔军校廿一期、原《科技与出版》主编、《黄埔杂志》副总编 | 程里民 |
| 87、母恩难报于万一 |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陈玉堂 |
| 88、儿子就是上帝 |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 潘亚墩 |
| 89、永恒的思念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彭 拜 |
| 90、伟大的母爱和母教 | 黄埔军校六期、作家 | 林涤非 |
| 91、回忆我的母亲 | 原中共梅县地委宣传部部长 | 罗 滨 |
| 92、桥边——记我的母亲 | 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编审 | 杜元明 |
| 93、怀念我的母亲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潘颂德 |
| 94、生母忆叙 | 加籍华裔著名医生 | 李如英 |
| 95、劬劳未报忆慈亲 | 黄埔军校十六期、小学教师 | 张伟民 |
| 96、母亲与我的生命同在 | 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 徐中玉 |
| 97、我的母亲 | 公安干部、工程师 | 李石传 |
| 98、我的母亲 | 中国核学会理事,湖南省新技术开发局研究员 | 周全之 |
| 99、怀念我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 原五华县副县长 | 戴焕猷 |
| 100、思母 | 离休老干部、《诗词》报主编 | 赖春泉 |
| 101、怀母 | 文艺工作者、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 小 英 |
| 附录一：海内外中华人士共颂伟大母爱与贤母的巨著 | | |
| ——《我的母亲》丛书评价 | | 莽东鸿 |
| 附录二：组诗——致《我的母亲》 | | 董汉章 |

伟大的母亲

澳洲 周光明

慈爱的母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但慈祥的音容常常在我耳边脑海显现,就像还活生生的坐在我的身旁,抚爱着我,关怀着我,叮咛着我,教导着我。

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从小就养成一付善良勤劳的性格。我的家是在中国广东省一个小县城普宁县,由于祖先的勤劳和奋斗,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家族。祖父还在世的时候,全家有五十多口人。父亲有八个兄弟,八个姊妹,因为大伯过早去世,全家主要的经营、劳作就由作为二哥的父亲操持,而能干的母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他老人家的帮手。母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很能体谅他人,自己又很勤劳节俭,叔伯妯娌都很尊敬她。大家庭,人口多,煮饭做菜难免有剩,每当有剩,往往由她组织人力收集起来,分发给穷困的乡亲们,特别是灾荒年景,她常常悄悄拿些衣物接济乡亲。

母亲读书不多,但在当地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乡里有什么事,总爱请她评个理;遇上喜庆活动,也少不了请她去出个头,她非但从不拒绝,而且还在这个时候,送点礼物,奏个热闹让大家过得都高高兴兴,因此母亲的善良和助人为乐,远近闻名,为我们家族添了不少光彩。

母亲一共生下我们兄弟三人,姊妹三人。除了养育之恩外,最使我难忘的是她对我备切关心和爱护。记得我十二岁那年,不知什么原因,我患了一种叫做“蛀骨风毒”的脚骨病,先是在乡里找中医看,后来一天比一天厉害,整个腿都肿了起来,疼痛难忍,躺在床上不能动,母亲整天陪着我,到处求医,并决定到县医院去诊治。我家离县城有不少路,当时交通又不方便,她叫人背着我陪同去找西医,结论是:要做两次手术,而且不能保证未来情形,

母亲那里肯答应；返家后，到处再访名医，也均药石无效，她就天天求神拜佛，如痴如迷，跑在院子里磕头祈祷。我躺在床上不能动，求姊姊去偷听妈妈在求什么，姊姊回来告诉我，妈妈在许愿：“宁肯自己少活几年减寿，也要让光明早日康复。”这些话，是一个做母亲最晶莹、最神圣、最无私、最纯洁、最高尚的爱。那时，我年纪虽然幼少，未能全部领会，但心灵上已烙下了母爱的伟大。正是这种爱，抚育了我，教养了我。从那时起，我就铭记着，我要为母亲去做一切，做最有意义的事。一日复一日，母亲为我的病消瘦了，憔悴了……由于祖父的努力，终于在外省找到了专医奇难杂症的名中医到家就医。也许是诚，也许是命，我在祖父、母亲的关怀下，经这位老中医悉心诊治，内服外敷，不到两个月，居然神话般地一天天的好起来了。但是，我却因此失去在县城上中学的机会；又是母亲的关怀，竟感动了乡里的小学校长：一位很有造诣的中国古文学家，特别为我专门开设了一个名为“中国古文专修学科”使我在行动不便时，有机会更多的接触到伟大中国的传统文化，领略到精深博大的儒家思想和处世为人之道。虽然至今，我的腿还留下了残疾，但更重要的是，在我心中留下了伟大的爱，正是此爱，使我终生铭记她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做人要上对得起父母，祖先，社会，国家；下要对得起子女，兄弟，朋友，多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事。”

1949年，我才14岁，家乡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国民党的统治结束，换来了共产党掌权。按当时政策，我家被列入清算。父亲一向做事谨小防微，他的不少朋友，亲戚悄悄劝说全家出走海外，但父亲怎么也舍不得这份家业，而且又觉得自己没做过甚么对不起人的事，迟迟不下决心，正好当时他有个好朋友要回香港去，愿意帮忙带去一个孩子到海外去闯闯。其时，我弟弟都还小，父亲决意让我去，母亲却十分矛盾，既怕我年纪还轻，行动又不便，远离他乡，失去依靠；又怕我留下受苦，惶惶终日，彻夜不眠。但她

终于决定了,要父亲与我同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她把她的心血全部放在这个决定上。在一个深夜,她拉着我的手,千嘱咐,万叮咛,要我勤于事业,不必眷恋亲人,我含泪离开了她。一别32年,海外飘泊,走遍东南亚,历尽甘苦。每当我事业有成或遇到麻烦,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都要去信问安禀报,而每次都得到她老人家的点拨,支持。

1970年,我在寮国做生意,公司的司机出了车祸,涉及人命,尽管不是司机的责任,更不用说是公司和我的责任,虽然错的是对方,但因死者的父亲是寮国一位有权势的将军,他仗着势力,不循法律途径,却提出一笔不可理喻的赔偿金要求,否则,将置公司的司机于死地,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下,我飞函禀告母亲,母亲来函训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能力做得到,一定要帮忙司机之危,好心一定有好报的。为此,我几乎把多年的积蓄,悉数拿去用在处理善后。事后,我并没有为失去财富而追悔;相反,我感到我已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社会做出的较大举动,也是我“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信念的开始。

我在海外几十年的努力的奋斗,朋友越交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但更重要的是,使我印证了母亲对我的教导:“你对社会贡献越大,社会对你的回报就越多。”这时,中国大陆不断传来改革开放的消息,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而且也根本不愿意回到在我童心留下阴影的家乡,尽管我无时无刻都在想见我慈祥的老娘,也只是通过书信和回乡亲友的口信来解除我的思念之情。终于在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我申请母亲来澳团聚获得批准,并于1985年成行来澳。母亲抵达澳洲后的几年,我与我的家人得以长伴她老人家身旁,侍奉膝下,家庭中充满了温馨与幸福,尤其是对于我几十年漂泊海外,没有尽到做子女应尽的责任,更加分外感到亲切,更加感到奉侍的不足。所以,凡我能做到的,我都尽量去做,让母亲老怀弥慰,而母亲则不忘时常以“善待他人”的训示开

导于我。



左—钱其琛,左二周光明,右—江泽民

(澳洲潮州会馆主席,周光明供稿)

1988年8月8日,澳洲潮州同乡会成立,我出任会长,在举行就职典礼时,邀请全世界各国侨团来参加庆典,政府官员与社会贤达济济一堂,六百余人,弄至酒楼爆满,盛况空前。母亲当晚在场亲眼目睹这一情景,喜极而泣,紧拉着我的手说:“今日你有如此荣耀,我十分高兴,不是你出人头地,而是你有这么多朋友,所谓“篱无柱则倾,人无朋则孤”。过了不久,母亲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抽出时间返回梓里一行,看看家乡的变化。当时使我不解的是:她在家乡受了不少的苦,为什么还那样地眷恋家乡?有一天,母亲再次催促我,母令难违,我答应尽快成行,同时向她提出了个问题:你不恨当地政府吗?母亲沉思后说“世界上有更多的是爱!……以你今日的成就,虽然不算是什么亿万富翁,但你赤手空拳能创出如此一番事业,我已心满意足,不过,儿啊!祖国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在家乡,您要尽你的力量为我们家乡做点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啊!伟大的母亲,你不是政治家,但你有无比宽阔的胸怀,那是因为你伟大的爱!

1989年,在我离家40年后,终于回到我的出生地普宁县,这

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一个由我率领的居住在泰国、香港、澳大利亚族亲，百人拜祖省亲团踏进了家乡的大门，使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由当地中共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总工会、农会、侨办主任等全班人马以及居民数千人，夹道欢迎。走过街道，只见一个接着一个用彩绸及鲜花搭成的牌楼，人群簇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之浩大，恰似儿时所见到的元宵佳节的景况。据后来有人告诉我，光是牌楼就有八个之多，就是40年前县城解放庆祝大会也没有这么热闹。其后，我们参观了家乡，所到之处，一片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乡亲们之热忱、友善，使我们十分感动。这更证明了母亲的眼光，母亲的宽阔胸怀。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有谁不爱自己的家？！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那次，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我没有使她老人家失望，我决定尽我一点绵力，为家乡做了点有益的事：我为当时正在筹建的医院捐了整一个病房，并与几位兄弟共同筹建了“教育福利基金会”，抱着抛砖引玉的愿望，能为家乡的福利事业打前锋，让更多的孩子沐浴在爱的阳光下，为祖国做更多宏大的事业。

1989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澳洲悉尼，我出席了那次盛大的欢迎宴会，我并不以在主席台上与十二亿人民国家的总理坐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而是以身后有这一位贤明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此后，我接触到更多华人社区，也做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的公益事业，特别是当我接受英女皇陛下授予我OAM勋衔时，我更加怀念我的慈爱的母亲，更加把她老人家对我的教导归结为：“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以之作为我今生的座右铭。

今年九月，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阁下访问澳大利亚，我很荣幸的获澳洲联邦总理何华德先生的邀请出席国会国宴。同晚悉尼澳洲华人团体协会与澳中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盛大而隆重的千人欢迎宴会上，我更荣幸的获安排于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及江夫人共渡一个毕生难忘的晚会，这种光荣是亿万人的梦想，亦是很多人的希望。晚会上，江主席兴高彩烈，破例的登台唱了几首中英文歌曲，如雷鸣般掌声震撼了整个会场，主席展露出了伟大领袖博学多才的风范，亲善亲民的作风，给澳洲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此情此景又使我忆起了我的母

亲,而我心内亦静静的告诉自己: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亦是最幸福的一天;如果我母亲仍然在世的话,当她老人家见到此一情景,相信她一定会喜极而泣,老泪纵横。啊!慈爱的母亲,我永远的怀念着您!



左一李瑞环,右三周光明
(澳洲潮州会馆主席,周光明供稿)

敬爱的母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她安静地躺在这美丽的澳洲沃土上。生前,她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要回家乡终老颐养,她经常以朴素的语言念着:“我们的根在中国!”啊!敬爱的母亲,你虽不是伟人,但你身在海外,却把自己的心和血,抛洒在遥远的祖国。我不会忘记这些嘱咐,因为你的博爱和仁慈早已注入了我血液;虽然,我用你的名字捐建了“禅清亭”来纪念你老人家的伟大,如今,它已经屹立在南半球,朝晖夕映,但它也会有终期,唯有母亲的光辉在我心中永生!

慈爱的母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她给我留下的不仅是我的身体,而是留下了她的伟大的爱,留下了令我终生受用的“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人类的人”的道理。她要我做的,我已做了,尽管我还做不够,她将督促我,驱使我继续去做。

慈爱的母亲,你可放心了,今天,不仅我在做,而且会有更多的人去做,以使人们过得更幸福,更真诚,更自尊,更和睦。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母亲。

我的母亲

刘小晴



刘小晴在上海豫园接待美国克林顿总统，并作书法表演，作品赠克林顿总统
(刘小晴供稿)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执教于上海体育学院，父亲很古板，解放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他不但能写一手好字，而且还精通古文诗词，性喜饮酒，每与朋友觥筹交错之际，说论古今，极其豪爽，父亲对我管得很严，传统式家长的味道很浓，而我母亲丁景清是一个很现代的人，勤奋好学，尽管他在体院执教艺术体操及舞蹈，但她对中西艺术抱着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什么都学，如昆曲、西洋舞蹈、民族舞、古曲舞等，又曾跟胡蓉蓉学芭蕾，此外还要自学外语，她的工资几乎都花在学习上，家中的一切开销都由父亲负担，要记得我上小学及初中时，父母就各自按照自己的教育方式来培养我。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还教我作诗、练字，而母亲却希望我在音乐舞蹈上有所成就，我曾跟一个白俄舞蹈家麦唐姆学过芭蕾，又随上海音乐学院的徐祖颐学过钢琴，而我的大哥刘明义是上海乐团著名的男高音演员，三哥丁明聪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大提琴手，可以说是一个

艺术文化气味很浓郁的家庭。遗憾的是我小时候并不十分珍惜这优裕的环境,只是一味地调皮,父母教的都不喜爱,相反热衷于体操、游泳、乒乓、篮球等运动,或和小朋友打弹子,飞香烟牌子,连功课也懒得做,无忧无虑,实在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母亲对我几乎是溺爱的,父亲打骂我时,她会和父亲吵起来,我更是有恃无恐,物质生活的优裕养成了我的惰性,家庭环境的熏陶都在我的心底里深深种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我的家庭开始走下坡路是五七年反右斗争,我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之后我大哥刘明义在上海乐团也错划成右派,工资被压到几十元一个月,家庭重担落到我母亲头上,在逆境中我母亲在工作上更是勤劳,早出晚归,把一切精力都扑在教学事业上,全国第一届运动会的团体操即是我母亲参与编排的,因而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奖章,在发奖时刘少奇和我母亲亲切握手并摄影留念,她又连续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然而在政治上受到父亲的牵连,一直未能抬起头来,作为我,一个右派份子的子女更是首当其冲,59年高中毕业时,成份好的同学都派到复旦大学半导体专业,我却因父亲的关系被拒之大学门外,做了三、四年社会青年,在这期间通过我大哥朋友的介绍,得以结识上海著名画家钱瘦铁先生,并投拜在他的门下学习书画,开始走上了正规的道路,我母亲在我身上作了大量的投资,笔墨纸砚及书画资料,都得花钱,那时我又适逢患病在身,患结核之疾,更需营养和治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自己不得不节衣缩食,以保证我的营养。62年时,为了我的前途问题,母亲又四处奔走,托人帮忙,终使我能有机会进入上海市中医带读班学医,在六年的学医期间生活的艰难不得不使我发愤图强,立志要学有所成,不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于是便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刻苦研读中医经典著作,读医之余,则留心翰墨,同时对书法理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铁老家中藏书极丰,我便借来阅读,并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抄录下来,制成卡片,不数年间,几盈箱篋,为我以后钻研书法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66年文革开始,厄运接踵而至,父亲是大右派,自然首当其冲,母亲又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更因与刘少奇的合影几乎成了有力的罪

证,于是批斗,抄家,写检查,关牛棚,无止无休。在抄家前夕,家中非常紧张,最担心的是我父亲几十年来的诗词手稿和家中收藏的名家字画和珍贵碑贴,有一天晚上,我将家中的手稿和名贵碑贴一大捆转移到党兄弟家中,以为侄子是中共党员,三代贫农,又是工宣队头头,放在他家中最保险。不意一年后他突然来我家说造反派指责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扬言要到他家里抄家,恐慌之际,花了一个晚上将手稿和碑贴付之一炬,全部烧光,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文革期间我父母的工资都被降到每月15元,房间亦由原来的四间压缩到一间,整日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之中,学校里革委会的一只高音喇叭正好装在我家窗外,每天都要勒令×××即刻去革委会报到,我母亲胆子又小,一听到喇叭响便伏在窗边听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小将突然闯入我家将我父亲及其他大学教授押到操场上,叫他们一个个从椅子底下钻过去,一面用墨汁、浆糊倒在他们头上,然后押到台上批斗。当时我正在嘉定县实习中医,抄家期间我母亲逃到嘉定来找我,说父亲被关押到牛棚里去劳动,学校又要叫她交待自己的罪行和揭发父亲的反动言论,每天都要写交待和揭发材料,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我母亲得了青光眼,只能叫我回去帮她写,在患难中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经常抱头痛哭、窘穷、潦倒、失意、痛苦、落魄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仿佛是一场恶梦。68年毕业分配时,正好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号召知识份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被分配到宝山县刘行当赤脚医生,边劳动边看病,诊余之暇,我只能从书法中去获得安慰和解脱,想不到刘行又是一个极左的地方,当地公社领导和卫生院领导看到我在练字时就指责我搞封资修的东西,于是我只能偷偷地学,偷偷地练,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就沉浸在书法艺术的天地之中,大队卫生室没有桌子,我便自己用三夹板钉上四只脚作练字之用,无钱买纸我便在废报纸上练,大热天时蚊子多,我便穿上长统套鞋预防蚊虫叮咬,文革十年期间从未间断。我母亲更是省吃俭用,帮我买一些水果,饼干及营养品亦从未间断,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使我彻底地领悟到人生、领悟到艺术的真谛,体会到母爱

的伟大。

文革结束后，我家开始时来运转，父母和大哥都陆续被彻底平反，我亦由刘行调到五角场医院，父母和我亦相继入党，又考入上海市中医研究班，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后，上海书画出版社要物色我去担任《书法》杂志的文字编辑，最后通过杨浦区区长钱铮的帮忙，终于弃医从艺，于76年调入书画出版社，调入后我深知作为一个杂志的文字编辑，如没有几本著作出来就很难在书界立足。于是我便发愤著书立说，在数十余年间由于精力旺盛，除上班之外，每晚都是写作到半夜二三点钟，那时我母亲已七八十岁，依然执教于课堂，发挥余热，报纸上也屡屡介绍她的事迹。母亲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深知人生的意义并不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裕和满足，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在我对艺术上的追求永无止境，在追求学问和艺术的同时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然而事物总是有矛盾的，照理说我父母健在时我应多陪他们讲讲话、共叙天伦，尽尽孝心，但为了写书和练字，我很少有时间陪他们聊聊家常，“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父亲经常对我说的话，可是我当时并不真正的理解，但当我一旦失去双亲后，已懊悔莫及，失去的是真诚的爱，得到的都是虚名浮誉。每于深夜扪心自问，我这个不孝之子是无颜面对先人的。

前年我去四川出差，朋友陪我游览了峨眉山，面对巍巍高山我只是感到自然的伟大和我的渺小，正如我面对浩瀚的传统与伟大的母爱，尽管我也很是骄傲，但与前人相比，与当今学术界的名人相比，愧汗未尝不发背而沾襟，因此我从不敢以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而自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或书法艺术的工作者。母亲虽离我而去，但她伟大的母爱却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她的敬业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名啊！利啊！一切都是空的，留下来的是作品，是文章，是啊！非啊！一切都由后人来评说，唯一我能报答母爱的是在事业上的奋斗，不管成功与否，我将一往直前，乐此而不疲。仅以此短文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我的母亲何舍耕

千家驹

提起我的母亲,真叫我涕泪交流,永志不忘。我的母亲姓何,讳舍耕。乃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人,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性刚直,与先父感情不睦。自我出生后,即与先父分居。我上有两姐,一名如娥(现改名如我);一名如嫦(现改名如常)。如常长我四岁,如我长我三岁。因家境贫穷,如常自幼给人做童养媳,夫家姓林,住离城三十里的双开(地名),以种玉米为生,丈夫长她十岁,乃一农民。母亲以自己不识字,处处吃亏,故将如嫦大姐于她七岁时接回家来,教她进小学读书,以备写信记帐之用。大姐知识渐开,自不满意她的包办婚姻,与她丈夫同村的一个林姓青年恋爱。但他们是不能结婚的,因为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妻之夫(虽然都未达结婚年龄,没有结婚)林姓青年名登岳,曾受教于二十年代上海地下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思想左倾,他与我大姐于1925年秘密前往苏俄,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俄共正在进行激烈的派系斗争(斯派与托派)这也反映到中国的留俄学生中来。林登岳被王明等所谓“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陷害,被捕入狱,判七年劳改后又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过了27年岁月,直到斯大林逝世,才得到平反。50年代返回中国,已是白发苍苍了,而我大姐则被捕后不知所终,想已瘦死狱中。此亦大时代中之牺牲品也。

我幼时只同母亲及二姐共同生活。我父亲早想将先母遗弃。当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自我出生后,先父不敢再提离婚了(当时叫“休妻”)。因为千姓已“有后”了,于是他采取当时士大夫娶妾的办法,在外娶妾生子,置先母于不顾。

当时我母子三人,完全靠我母亲帮人缝补、做针线过活。后经同乡调解,先父每月补贴生活费拾元(大洋)。先父过二三年偶尔回家一次,不与先母同住,而住在我祖母家里,所以我和父亲如

同陌路人一样，从未共处过一天，而我母亲对我则爱护备至，她把我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一九二五年我师范中学毕业后，想去北京报考大学，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他回信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你还是找一个小学教师当当吧，不要去升学了。”其实他是怕我升学要他供给学费，增加他的负担。但我母亲却爱我情深，不甘于此。她求亲问友，为我筹借了百多元旅费，要我去北京报考大学（当时从武义到北京要半个多月）。我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1932年北大毕业。毕业后即承胡适之先生介绍到一个经济研究单位（社会调查所）工作，工资约每月八十元。我有了工作后，立即接我母亲到北京侍养，并将二姐介绍入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学习。我母亲到了北京，我带她游览了所有北京名胜，如故宫、万里长城、颐和园等地。她老人家说，在武义像她这样一个不识字又不会说普通话的妇女能到北京游览恐怕只有她一个人吧。以后我到那儿工作，总把她带到身边。抗战八年，我在广西她也随我到广西。解放以后，我回到北京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母亲也到了北京，凡有游艺性的晚会，我总带她老人家去观赏。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母亲因受惊以九十七岁高龄弃世，我母亲一生艰苦，晚年总算享了几年福。

最后我题了两句话，以纪念我所敬爱的母亲：

母恩重如山
母受永不忘。